

纪念毛主席视察二十周年和建校六十五周年 我校文科广泛开展学术讨论

在隆重纪念伟大导师毛主席视察廿周年和建校六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校举行全校性的大型科学报告会。报告会从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按学科分别举行,共提出学术论文二百四十六篇,其中理科一百七十一篇,文科七十五篇,广泛交流了科研成果,活跃了学术空气。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论文,内容十分广泛。有的密切结合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从学科领域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动谬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力求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问题,直接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服务;有的力求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的文化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对各学科的一些问题进行新的探索;有的侧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用科研成果为国际政治斗争服务;有的对国外经济发展状况、学术动态和文学作品进行了评介。

这次学术活动,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给各学科不同学术观点都提供讲坛,有的系还组织了学术讨论,就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又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下面是部分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不同学术观点。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问题

大家都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对“唯一”是什么意思,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唯一”,就是“最终”的意思,“归根到底”的意思。因此,承认实践标准,

并不排斥其他东西可以作为“间接标准”,如逻辑证明,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就可以充当这种“间接标准”。理由是:(1)列宁说过,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理论则有间接现实性的品格,因此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可以间接判断认识的真理性的;(2)每个人不可能也不必事事实践,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人们往往是根据已有的知识,间接的经验来判断是非、真伪的;(3)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意义,可以作为我们检验真理的间接标准。如我们可以断定,凡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必然是错误的,合乎辩证法的认识必然是正确的;(4)在实际生活中,判断一些言论、行动是否正确,往往是看它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我们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标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识别走资派的标准。我们揭批“四人帮”,也是引用马列和毛主席的语录来证明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是荒谬的、反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唯一标准”就是只有一个标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标准。因此不同意“间接标准”论。理由是:(1)理论不具有直接现实性,只有实践才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只有实践才能把思想、理论等观念的东西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2)每一个人虽然不可能也不必事事实践,事事直接经验,但在你为间接经验者,在别人则仍为直接经验,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指人类全部实践的总和;(3)逻辑证明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检验真理,而是解决思维是否合乎逻辑,即是否合乎思维规律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作为我们分析、论证问题的依据,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要由实践

来检验。不能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混淆起来。违反辩证法的认识必定是错误的,正确的认识一定要符合辩证法,但符合辩证法的认识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它并不一定同具体的客观对象相符合。所以不能把辩证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4) 六条政治标准、三项基本原则等等,是人们判断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标准,不能把它同认识论上检验真理的标准混同起来。例如,用三项基本原则来衡量,凡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就是走资派,否则就不是。当人们根据这个标准,对某个人进行判断,说他“是”或“不是”走资派时,这个判断是否同客观对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只有靠实践。

关于真理的阶级性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真理是有阶级性的。理由是:(1) 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在阶级社会里,认识的对象——社会现象是有阶级性的,认识的主体——人是有阶级性的,因此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就必然有阶级性;(2) 客观性和阶级性是真理的两个属性,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用客观性来否认阶级性,真理的这两个属性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3)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不仅哲学社会科学有阶级性,就是自然科学也要打上阶级的烙印;(4) 如果承认马列主义既是真理又有强烈的阶级性,那么,说一切真理都没有阶级性,在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态度是受阶级立场制约的。但真理本身,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真理,都是没有阶级性的。理由是:(1) 真理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真理所反映的内容的客观性,决定了它本身不具有任何阶级性质,因此,真理的客观性和所谓阶级性是不相容的;(2) 在阶级社会里,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对同一事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可能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关于同一事物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真理不能因人而异,因阶级而异。

正因为真理是客观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3) 主张真理有阶级性,是把真理同对真理的认识和态度,真理同真理为谁服务,真理同思想、理论、学说等几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了;(4) 主张真理有阶级性就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主观真理论,认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真理,从而否认客观真理,取消真理的客观标准。

关于真理和谬误的关系问题

为了批判“四人帮”在真理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有的同志分析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谬误。理由是:(1)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中都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暴露出来的错误方面;……”恩格斯的这个科学论断,为全部科学史所证实。牛顿力学、波依耳定律等,都是包含着少许错误的真理;(2) 人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象都必须采取普遍性形式,而这种普遍性的形式都有一定的幻想成分,因而不可能绝对排除它有谬误的方面;(3) 实践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不能完全证明一个合乎真理的认识的一切方面,所以真理可以包含着错误;(4) 主张真理中包含着少许错误,并不会混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因为这个界限不是我们主观确定的,而是由实践来确定的。说真理中包含着谬误,也不会削弱理论的指导作用,相反地有助于正确地对待革命理论,因为只有对革命理论的某些个别原理和结论持怀疑态度,才能使革命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致于成为僵死的教条,“终极的真理”。

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真理和谬误是两个对立的范畴,主张真理中包含着错误,那就要修改真理的定义;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会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

关于按劳分配规律的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1) 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按劳分配的基本前提条件和可能性;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人们思想觉悟水平的限制使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乐生的需要，还不得不作为谋生的手段，使按劳分配具有客观必然性。按劳分配规律的核心是要求报酬量同劳动量相一致；（2）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就劳动的三种形态来看，劳动的流动形态，即劳动者实际支出的劳动，一般来说具有直接根据的意义，但必须参考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同时，在劳动成果能够较准确反映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时，劳动成果也是一个主要依据；（3）根据按劳分配原则直接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消费的部分，在量上应有一个最低限，就是要保证劳动者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需要，但不能止于此限，还必须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精神。

对以上问题，有的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1）把劳动作为谋生手段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特征，并把它作为决定按劳分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原因是不妥的，因为任何社会劳动都是谋生手段，共产主义社会也首先是谋生手段，然后才是乐生需要；（2）只有三种形态的劳动的“综合”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不论那种按劳分配形式，既要考虑劳动的实际支出、劳动成果，又要考虑劳动能力，不能只是其中一项作为标准；（3）按劳分配中的工资最低限的依据应该是：积累可分量的大小；一个半人（包括劳动者自己）的生存、发展、享受三部分的基本生活需要；（4）报酬量不仅要体现个人劳动的差别，还要和集体效果相联系，体现企业之间的差别。

关于如何认识和批判“四人帮”

反动文艺理论体系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四人帮”为了炮制阴谋文艺，为其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多年来强制推行种种反动文艺观点，虽然，这些观点鸡零狗碎，漏洞百出，但还是自成体系，有一条黑线可循的。是一个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反动文艺理论体系。那么，这个反动理论体系的核心是什么？

讨论中许多同志不同意前一段报刊上的一种流行看法，即把“黑线专政”论看作是“四人帮”文艺理论的“支柱”，他们认为“黑线专政”论只是

“四人帮”对十七年文艺战线形势的一种颠倒黑白的估计，是为其兜售反动文艺理论制造舆论的，根本说不上是什么理论，所谓“支柱”更无从谈起了。对什么是“四人帮”反动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一切文艺理论都是依据它回答“文艺是什么”来决定它的性质和建立它的体系的。“四人帮”正是从颠倒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入手来建立他们的反动文艺理论体系的。所谓“从路线出发”论是这个反动体系的核心，即狂言“要打破生活规律”，断定文艺是主观精神的产物。所谓“反写真人真事”、“主题先行”、“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三突出”、“反形象思维”、“扫荡遗产”等等谬论，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它们或者否认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或者割断文艺随社会生活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联系；或者取消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或者抹煞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各种各样人物的原则。由于抽掉了社会生活这块基石，于是，他们便随心所欲地把文艺变成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传声筒。所谓“根本任务”论，集中体现了“四人帮”文艺理论体系的这种反动政治实质。

另一种意见认为：剖析“四人帮”的文艺理论体系要抓住他们假左真右、篡党夺权的实质，否则，显不出其特点，击中不了其要害。同所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一样，“四人帮”也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提倡发展什么性质的文艺”这一根本问题，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他们从否定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入手，以所谓“根本任务”论（即鼓噪大树特树“帮英雄”）为其核心，并由此制造了种种反动文艺观点。所谓“三突出”、“主题先行”、“题材决定”……等反动谬论，都是为实现他们塑造“帮英雄”的根本任务而派生出来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战线

形势的基本估计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战线仍然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理由是：（1）华主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二十八年来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下转第61页）

恰好在这个时候，神通广大、胜算在握的赵伯韬又突然出现了。与吴荪甫的“浑身没有劲儿”相反，赵伯韬这个时候是趾高气扬的：

忽然三四个人簇拥着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嚷嚷笑笑进来，从吴荪甫他们桌子边跑过，一阵风似的往酒吧间的后面去了。
.....

在吴赵双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作家为他们安排这样一个偶然的相遇，是经过一番艺术匠心的。吴荪甫在这个地方的出现，是想“借酒浇愁”；而赵伯韬的来到，也很符合他的一贯糜烂腐朽的生活。在他们两人的这一场会见中，吴荪甫表现出着着失败而又想苦力挣扎，势必投降而又不肯过失“体面”的复杂矛盾的心理；而赵伯韬则俨然以胜利者自居，对吴荪甫横加压力，促使他早竖降旗，而骄横之态，更是

溢于言表。这也是一场刻画赵伯韬性格的有声有色的描写。

作家在故事进展的重要关头选择和描写了这样三个场面，把赵伯韬的性格从各个不同方面展示出来，使得那些虚写或侧面带出的事实具有更大的真实性，使读者对赵伯韬这个人物产生出更大更强烈的愤怒和憎恶的心情。拿赵伯韬的性格和吴荪甫的性格相比较，吴荪甫的性格相当复杂，这主要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决定的，而赵伯韬的性格则比较单一，这是因为买办资产阶级是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的缘故。就刻画的完整和深刻来说，赵伯韬的形象虽然不及吴荪甫，但是作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形象来看，还是有较高的典型意义的。

(未完待续)

- * 这里的“身材高大”似与前面介绍的“中等身材”颇不符合，是作家行文疏忽，还是这天夜间赵伯韬的出现，从吴荪甫看竟尔显得高大起来了呢？姑志数语存疑。

(上接第79页) 这就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战线；(2)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周总理曾对文艺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是对“四人帮”文艺黑线的有力批判；(3) 面对“四人帮”的疯狂打击和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没有屈服，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坚持斗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深入生活，坚持了文艺的正确方向，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4) 虽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文艺战线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顶住逆流，冲破阻力，创作出一批象《创业》那样的优秀文艺作品，数量虽少，但代表了正确的方向，体现了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战线是“四人帮”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占统治地位。理由是：(1) “四人帮”反党集团中有三个是搞“文艺”起家的，他们窃取了文艺战线的领导权，强制

推行文艺黑线，他们对文艺战线控制之严，影响之深，危害之大都超过了其他战线；(2) 毛主席、周总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不是被“四人帮”歪曲、篡改，就是被他们严密封锁，很难贯彻执行；(3) 广大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抵制和斗争，只是表明“四人帮”人心丧尽，极端孤立，文艺黑线的推行遇到很大阻力，但不足以否定这条黑线的统治地位；(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战线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正说明“四人帮”文艺黑线占统治地位；(5) 华主席的指示是从总体上说的，并不否定其中某个战线、某段时间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正如长江总的方向是向东流，但不排斥其某些地段是向西流一样。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必划分前十七年和后十一年，还是按华主席指示，总起来提二十八年来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始终在文艺战线占主导地位较恰当。

(科研科)